

GONGMUWENJI

公木文集

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第1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公木文集.1/公木著. —长春: 吉林大学出版社, 2001.8
ISBN 7-5601-2507-7

I. 公… II. 公… III. ①公木-文集②诗歌-作品集
-中国-当代③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27838 号

公木文集

第一卷

公木 著

责任编辑:黄曼萍 责任校对:郝长海 封面设计:张冰沉

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
(长春市解放大路 125 号)

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2001 年 8 月第 1 版

印张:25 插页:2

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590 千字

印数:1—2000 册

ISBN 7-5601-2501-8/2·149

定价:44.00 元

全六卷总定价:255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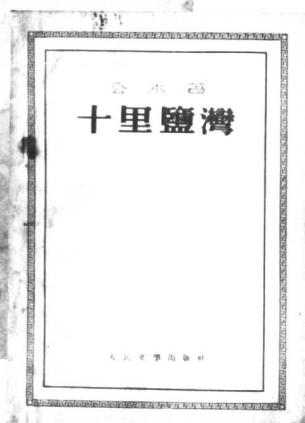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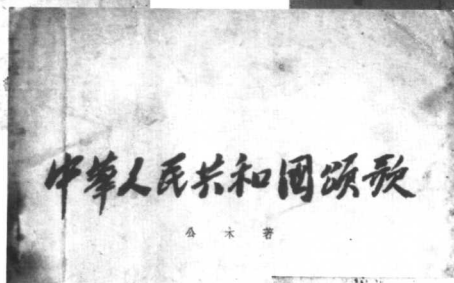
1927 年夏摄于直隶省（河北）正定县立第七中学三年级。



1942年5月公木（后二排左六）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。



1945年8月31日公木（第二排右一）与东北文艺工作团成员出发前摄于延安鲁艺。



诗集《鸟枪的故事》、《哈喽，胡子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》、《十里盐湾》、《黄花集》书影。

编辑说明

一、《公木文集》主要收录了公木先生公开发表和出版的诗文作品和论著，也收录了一些未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手稿。译文、与他人合作的以及主编的作品，一律没有收入。

二、《公木文集》共六卷。第一卷为诗歌散文；第二、三、四卷为古典文学及中国文字学研究；第五、六卷为新诗理论、文艺学研究及毛泽东诗词鉴赏。

三、在编辑体例上，除按内容、文体分卷外，在各卷之中大体按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进行编排。第六卷附录了公木先生的著作目录。

自 传

乳名顺通，学名张永年、崧甫，现名张松如，笔名公木，又龚棘木、章涛、木农、席外恩、四名、魂玉等。

1910年农历5月15日出生于直隶省（今河北省）束鹿县（今辛集市）北孟家庄一个农民的家庭。父存义只念过两年私塾，母李梅不识字。幼年在外祖父家支助下入学读书，1917年入私塾，翌年转村办初级小学，先念了一年“子曰诗云”后，又读起“小桥明月凉风”来。“五四”的风吹来了，“ㄅ ㄆ ㄇ ㄎ”成为新事物，学会了拼音，觉得比私塾老师教的“五方元音”可灵便多了。

1922年春升入深泽县河疃高级小学，是父亲背着一布袋小米送去的，入门升堂，先给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牌位磕了三个响头，就算录取了。主任教师曹席卿（怀珍）老先生是清末童生，又于民国入天津师范毕业，长子曹贡生（保定师范毕业）、侄子曹俊生（育德中学毕业），轮番来校助教，均不索工薪，只和全体学生同桌就食。学生亦不交学费，只供米粮蔬菜，一律住宿校内，周日也不放假。校规极严，教鞭戒尺是经常动用的。课程除英文是由一位不住校的王先生担任外，其余国文、算术、史地、博物、音乐、体育等均由三曹轮教，老曹老师还自编一部“语学”，实际成了主课，我的语文基础便是

在这时打下的。国文课教的本是文言，作文也以文言为主，一次老师命题竟是“任作一文必用夫然故虽四枢字及乎也矣焉哉五尾字”，这就是结合“语学”进行教学和习作，我此次作文题曰《雷殛为盗者说》，正文是：“败德之事多矣，岂独为盗哉？然为盗尤为甚焉。夫为盗，穴人之墙，入人之室，掠人之财，污人之妻，其罪大恶极，虽穿硯秃笔难尽也。故天打五雷轰之，不亦宜乎！”这篇作文得到曹席卿先生激赏，判了100+20+80分。当时作文课，从无得100者，此为特例。而在这中间，大曹老师善书法，小曹老师则以《独秀文存》、《胡适文存》、《白话文苑》、《白话书信》及《新潮》等书刊作辅助教材，更引起多数同学习作白话文的兴趣。周日上午学生轮番登台讲说故事，讲完以后，公议选定一则或两则，下午分组用文字整理出来，交老师评阅，这是学习运用白话的好机会。校制原定三年毕业，我只念了两年半，便考入中学。在高小读书期间，我十二岁那年冬天，由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给我娶了一位媳妇。当时我确实还不晓得娶媳妇是怎么一回事，只觉得披红带绿，又坐花轿，吹吹打打，是很好玩儿的。晚间由妈妈怀里换到一位长我六岁的大姐怀里去睡觉，虽然有些陌生，也不免腼腆，可是既然是高小生了，已经离家住宿了半年，仗着胆儿，也并不怎么害怕，反倒感到几分体贴亲切。不过，什么叫“两口子”，渐有所知，还是在两三年后，那就是我要上中学的时候了。

1924年暑假，以名列榜首考入直隶省立第七中学，校址在正定县城内，离家140里。在中学的四年，正是中国大革命时期，正定虽在北洋军阀统治下，直系晋系奉系轮番易手，国民军第三军也曾一度进驻，校内党团员的工作是很活跃的，校长训育主任还有不少教员是国民党，1925年五卅惨案、1928年五三惨案，都曾罢课声援，全体师生分入市郊农村宣传，

远达石家庄结队示威游行，焚烧日货，这使我在政治上受到启蒙教育。1927年共产党员高克谦同学在石家庄被军阀杀害，校内为他开追悼会，训育主任胡韵笙赠送的挽联：“吴将军遭暗杀，高烈士又惨死，一地永埋双侠骨；太行山头明月，滹沱水上凄风，千秋凭吊两英魂”。当时整个北方社会还处在漫漫黑夜中，我们校内国共合作的形势，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也于课外接触过一些新诗文，读鲁迅、郭沫若以至蒋光慈的《短裤党》、《少年漂泊者》等，都极受鼓舞，在校图书馆里也能翻阅到《新青年》、《向导》、《创造》等期刊，更感到新鲜。不过我个人那时还是以课业为重，政治觉悟是很低的，只盼望国民革命军北伐早日到达，献身革命的要求尚未萌生。在国文教师赵召德先生热心指导下，初步学习了作诗填词，有些习作，不脱模仿痕迹，曾向京津报纸投稿，也偶被刊用，这诱发了我对诗词创作的兴趣，甚至自作多情，也曾写过一些《忆内》、《闺怨》一类东西。这种情调直到考入大学以后，才逐渐变化了。

1928年夏蒋介石国民党打到北方，迅速暴露出国民党与土豪劣绅相勾结的面目，彻底粉碎了我在幼稚的心灵中盼望北伐军的幻想。是年秋到北平高考，国立院校都陷停顿，先考入了天主教主办的辅仁大学，很不满意，两个月后又考入了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，经过“复大”斗争，后恢复了北平师范大学。革命转入低潮，情绪非常郁闷。曾写过一篇《孟老先生歪传》，嘲讽了国民党与封建势力合流，在西城的一家报纸上发表后，第一次得到五元钱的稿费。在人生道路上，这时期还是茫然的，仍处于上下求索的状态，初入师大，曾与同学程金造，一道求教于高年级的王重民同学，在其指导下读《论语》和《史记》，对于高步瀛教授的《唐宋诗》与孙蜀丞教授的《宋词选》更深感兴趣，同时对于蒋光慈的诗，钱杏邨的评论，

也极为热中。不久之后，1929年春与同学赵慎馥、刘锡麟、孙秉哲还有两位赵君，为着探讨中国社会出路与发展前途，自发组织一个“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社”，白天分头读书，晚间集体讨论，狼吞虎咽读了一些报刊和小册子，还有从《三民主义》、《建国大纲》到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左派幼稚病》、《二月到十月》等等。每次集会都争论得面红耳赤，击案拍胸。这个活动被师大党组织发现，有意识地加以指引，遂使我们研究社的几位同学，大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在这期间，偶然在图书馆阅览室结识同学谷万川，他为《益世报》副刊主编一个专页，刊名《初步》。他拉我写稿，我便写了两三篇诗文，在谷万川影响下，文章中也开始使用起“布尔乔亚”、“普罗列塔利亚”和“无产阶级文学”等等术语来。逐渐在学习中批判了类似钱杏邨式的极“左”观点。1930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随后在校内发起并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、左翼作家联盟及华北左翼教师联盟等组织，并参加“北平文总”的活动。不过最主要的活动还是在街头巷尾涂写粉笔标语，在天桥西单等地搞飞行集会散发传单等等。这年“八一”，因参加纪念南昌起义、庆祝长沙解放及反对军阀混战的游行示威，捣毁国民党党部，被捕。一道被捕的五十人，连同前期已拘留的共三百多位同志，我的老师范文澜先生也在其中，一起羁押在北平警备司令部的监狱中，一个大号子里住二三十人，十几个大号轮番放风，到院子当中转一个圈儿，再去“稀屎洞”解解手，镣铐声叮咣相应，整日不断。这实际上成为一个传授革命理论和交流斗争经验的学习班。九、十月间，政局变化，以阎锡山、汪精卫为首的所谓“扩大会议”瓦解，晋军仓促撤退，在押同志全部获释。此后，直到翌年“九一八”前后，便全力投入救亡运动。1932年3月18日因参加抗日救亡集会，再次被捕，羁押在北平市公安局。一个多月，由师大学生会和抗救会联合保

释。这年是学运高潮，师大校长徐旭生先生辞职，校政实际上由学生会及抗救会主持。是夏师大暑期学校，是教联主办的，我任文书主任，教师有马哲民、侯外庐、黄松龄、王慎明诸位先生，都是教联成员。这年冬天曾以左联关系用学生代表名义邀请鲁迅先生来校讲演，讲题是《再论第三种人》。讲演前夕，与同学王志之、潘炳皋一同访问鲁迅先生，听先生畅谈了许多关于文艺和政治的问题。我于当年曾写过一篇《鲁迅访问记》，发表在《文艺月刊》上。在这一段期间，我曾主编过由社联领导的《麀尔》杂志，并与谷万川、王志之等共同筹办《文学杂志》。《文学杂志》正式出刊时，已是1933年，我虽不在，仍保持着联系，参与编辑。

1933年春，由于躲避特务追捕，逾墙出走，被迫离校，后到山东滋阳县立第四乡村师范教书，讲授国文及文字学，兼做班主任。该校教师中有教联盟员孙铁夫、段雪生、熊渭滨、胡一若、钟鸣宇等，我正是通过教联关系才到这里工作的。因为是师范学校，我们便在同学中发展并建立了华北左翼教师联盟支部，在鲁南几个县的小学教师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。在此期间，我办了一件顶亏心的事，便是曾利用寒假回到老家闹了一次“离婚”，实际上只是在族叔张镜人协助下立了一张“自欺欺人”的文书，便把已经为我生育过两个儿子的“大姐”遗弃了。只在两三年前，还曾吟唱过：“怕听破晓啼，不上北京去”！那显然是虚情假意了。事实是内心里萌生着一种冲动，说白了也就是“喜新厌故”吧。而当时确实是甜美的。1935年春乡师学生涤薪，随我同赴北平，独立建立了小家庭，赁居西城天仙庵，度过了一个人间天上的寒假，假期后，把涤薪安排在北平育英女中寄读，我便接受河北正定中学聘书，前往任教。正定中学原是我的母校，这时的同事中只有姜文彬、王眉徵少数进步教师，教联的组织活动不易展开；学生里面思想极

活跃，我除担任全校的壁报指导外，还从事拉丁化新文字运动，这样联系面就突破了我任课的班级。是年秋，涤薪因参加读书会活动，被捕，获释后，辍学，迁来正定，这样我便在校外安家了。这时，《文学杂志》已被查封，主编谷万川也被判刑押在南京监狱里，所以在正定期间，写的诗文很少，只作过一篇《屈原研究》，是应孙志远为《东方文化》邀稿写的。另外，曾把在滋阳乡师编写的讲义加以整理，印行过一本《中国文字学概论》。并非热衷于著述，只是为了取得在高级中学任教的资格。不过，书是出了，教员还是没有再当下去。“双一二”事变后，学生中酝酿着一种不满情绪，为反对教员中几个国民党分子，突然罢课闹起风潮来。校当局暗地向省教育厅报告，指我是幕后策划人；教育厅派督学孟扶唐同志来校查办，他先到我家知会一声，让我不辞而别，回北平去。这时我们的女儿白桦还不满周岁，我只好留一封辞职信，便携妻将雏，经历一次逃亡生活，这已经是1937年春天的事了。

回到北平，先在石驸马大街一位杨姓宅院里，租赁了两间东厢房，把家安顿下。然后经过申请，又回师大中文系复学，文学院恰好就在石驸马大街，与我的住处不到抽一根烟的工夫。这时期，社联、左联、教联都已解散；曾与武新宇、张更生、李梦龄、王之平等共同酝酿，想把教联恢复起来，并拟订了“纲要”，未果；尔后便参加了“民先”的活动，同由“饭团”支撑的所谓“新学联”展开论战，主题自然仍是团结抗日救亡。在这半年间，写了一本《白茶斋九歌注》，是教了四年书的一点收获，但未得发表，便在炮火声中失失了。

芦沟桥一声炮响，抗战开始了。经过一个多月时间，从北平辗转到达西安。把不满两周岁的女儿白桦，托付给一个陌生人家寄养，养父李宏谔，回族，是一位好心肠的厚道人。曾写一篇《弃儿记》留给西安友人，便与涤薪一同轻装赴山西参加

了晋绥军区工作，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林老介绍的，结伴同行者二十多人。做过二战区动委会《动员》杂志编辑，做过神池县与岢岚专区干训班的主任与指导员，做过由程子华同志任司令员的敌后游击队的宣传股长，在宣传股里结识了很富文艺才华的马瑜、陈强、何文瑾、贾克等青年同志，还接触到分配来游击队工作的一些长征战士，包括抢渡大渡河的英雄。曾编写过一些活报剧和小唱本，《岢岚谣》就是这时写的。只是战地生活，飘转不定，印刷条件亦差，诗文稿多未保留下来。

一年后，1938年8月，为了护送几位不适于在前方工作的女同志回后方，西渡黄河，到达了延安。在抗大学习了四个月，在此期间入党。未及结业，调任抗大政治部宣传科时事政策教育干事，业余从事诗歌创作，作《新歌诗试论》。时郑律成同志也在宣传科任音乐指导，曾于无意间看到我抄写在笔记本上的诗稿，暗自为《子夜岗兵颂》作曲，后来连近二百行的《岢岚谣》也谱写了出来，这使我很感动，遂相约合作《八路军大合唱》。此议是由郑律成同志提出来的。时冼星海与光未然合作的《黄河大合唱》在延安演出，很受欢迎。“大合唱”这个名称，就是由此听说的。适值1939年7月抗大总校东渡黄河，迁往敌后，我和郑律成都被留在延安，分配到筹办中的抗大三分校工作。在此新旧交替之际，趁空完成了拟议已久的《八路军大合唱》。我只是写了八段歌词，创意布局，多得力于郑律成同志。其中《军歌》和《进行曲》两支歌，被军委政治部正式追认，刊登在总政主编的报刊上，得到广泛流传。此后与萧三、刘御、师田手、海棣诸同志共同发起并建立“延安诗社”，开展街头诗和诗朗诵活动，编印《诗刊》小报。在这期间遭婚变，深受刺激：“还有冒着毒烟的嫉妒，绝望的遗弃与被遗弃底痛苦，在毁灭底悬崖上的踟蹰。”受到徐光达校长和李逸民主任严峻的批评与热情的安慰，才得振作起来。申请赴

前方回到我的家乡冀中军区去工作，已蒙抗大与军委批准，正整装待发，旋以中央决定暂停向敌后派遣干部，未果。调任军直政治部文艺室主任，主编《部队文艺》杂志和《蒺藜》板报，成立以发展部队文艺创作为宗旨的文艺社团“鹰社”，成员三十余人，每月召开座谈会一次。同时写了《鸟枪的故事》、《哈喽，胡子》、《我爱》等诗。作为整风的一个重要环节，1942年5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，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，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。随后调转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。整风过后，于1944年秋与天蓝同志同赴南泥湾访问，是年冬与鲁艺戏音系孟波、刘炽、于兰、唐荣枚四同志一道赴绥德地区，下乡闹秧歌并采录民歌。这期间写的唱词，后来编印为一本诗集《十里盐湾》；采录的民歌与何其芳诸同志一同加以整理，编成了一本《陕北民歌选》。又集录并补编“信天游”，写成了一首长诗《共产党引我上青天》；就《移民歌》首段改编并填词，写成《东方红》歌曲，这是抗战胜利到达东北时才由东北文艺工作团集体完成的，不曾采用“领导人民闹斗争”的词句，保留了“大救星”的字眼，事后想来，是接受农民意识的反映。

1945年“八一五”以后，参加由舒群、沙蒙同志任正副团长的东北文艺工作团，近六十人；于9月2日从延安出发，10月底到达沈阳。做了短期文艺宣传工作和党的地方工作。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，主要从事学校教育，曾任东北大学教育长、教育学院院长、第二部主任、第三部主任及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兼副教务长等职，主讲《中国革命问题》、《战后国际问题》、《新民主主义文化》等政治课，讲授中文系的《历代诗选》，都编写了一些相应的讲义。参与《东北文化》杂志的编委会。建国前夕出版诗集《哈喽，胡子》。1949年10月1日在沈阳街头，看到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，写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颂歌》。随着新中国的建立，我也重新组成了家庭。时间：1950年2月3日，地点：长春。是经过三年多秘密的有时是内心的恋爱的结合，日近中天，才真正体验到“女人是男人的一半”。尔后得妻翔之助，得与寄养在西安的女儿取得了联系，还和困留在原籍久违的父母重得团聚，并使两个儿子得到补修学习的机会。1951年9月由于在东北师范大学被批判执行了“右倾机会主义教育路线”，主要是对于如何向正规化过渡进行过一些建议和探索，调任鞍钢教育处处长，遵照毛泽东同志“出钢铁，出人材”的指示，全力献身于黑色冶金企业的职工和干部的培训工作，也写过几首像《鞍山行》、《鞍钢小唱》等短诗。1954年夏调任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，编印诗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》，与杨公骥同志合写《中国原始文学》，共同拟就“中国文学史纲目”。秋调北京任中国文学讲习所副所长、所长，兼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，直到1958年。这几年间，依照“纲目”，编写过一本《中国文学史讲义》（油印、未正式出版），写过若干篇诗歌评论及有关诗歌创作的论文，汇集过一本评论集，出版过两本诗集：《黄花集》、《崩溃》，以龚棘木的名义发表过一些有关《诗经》及先秦寓言的译释和论文，这些都是写作文学史的副产品。1958年春夏间，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代表，赴匈牙利及罗马尼亚，在文化交流上主要是宣传“双百方针”；介绍中国文艺战线“反右斗争”的情况。如同受着一种什么不可知的力量的嘲弄似的，七月底归来，回到中国作家协会，自己也被指控为与由中宣部党委会构成的所谓“反党集团”“互相呼应，进行反党活动”，而被划为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”，并被开除党籍。同时，中国文学讲习所亦由中宣部及文化部决定停办。在京四年间，主要精力，用在青年作家培训和青年诗歌评论两个方面，同一代文艺战线上的新人建立了亲密的联系，生命也从而感到

充实。1958年10月戴帽后，积存未复的来信与诗文稿仍有二百多件，带着负罪的疚愧心情，悄悄地分作四五批挂号邮退，其情其景，黯然神伤，这是我同北京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协举行的告别仪式。再补述一桩纯属个人生活范围的私事：我的父母于此一年前，1957年3月8日深夜，在文学讲习所宿舍，为邻室倒灌来的煤气窒息致死于梦中，这件事曾使我深感悲痛，也给诸弟妹造成终生遗憾。但到1958年10月以后，每念及此，反觉轻松；两位老人如果再多活四百五十天，看到我如何结束文讲所的工作并离开文讲所的情景，不知将感到多少惶恐和迷惑。想到他们是在微笑的梦中离开这个世界的，可以算死得其时，死得其所了！

1958年腊月30日，丢下妻子儿女在北京，只身下放长春，任吉林省图书馆馆员。半劳动，半工作，既锻炼了身体，也学到了一点图书馆的业务知识，并且还获得了一个潜心读书的绝好机会。在这期间，曾由组织指定，参加了歌剧《青林密信》的创作活动。1961年5月初，又由组织指定，列名于省直农场“毛主席著作学习班”，这个学习班又是生产队，专收右派分子，进行教育改造。作为生产队成员，任积肥组组长；作为学习班学员，任学习委员，每周听讲后，负责组织讨论。半年后毕业。春播、夏锄、秋收，参加了一个全过程；《毛选》雄文四卷，也通读了一遍。摘去右派帽子，回到人民队伍中来，名字下又复现了“同志”二字，家眷也由北京调来长春，时在1962年1月。1961年11月被调任吉林大学中文系教员兼代系主任，1962年2月开学后，讲授“中国文学史”、“诗经”、“先秦寓言”、“古典诗论”及“毛主席诗词”等基础课和专题课，都编写了一些讲义，仅油印，未正式出版。风驰电掣，四年过去了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曾被批斗审查，两次抄家。《人类万岁》（手抄稿本），化作黄鹤，一去未返，不曾